



檐下记

一畦西瓜滋味长

□ 卢金星

周末上午，正陪儿子在地垫上搭积木，他堆的“高楼”每塌一次，就咯咯笑一阵。这时手机响了，是姐姐，“回来搞西瓜！地里的瓜结得多，又大又甜。”

挂了电话，心里暖了一下。在县城住了这么多年，每次“回家”两个字一响，身比心先动，仿佛有根看不见的线，一扯，人就该回去了。

午饭后，我开着车，载着儿子，往乡下老家赶。

到了地头，一片碧绿的西瓜地豁然铺开。圆滚滚的西瓜藏在叶子底下，像一群害羞的胖娃娃。儿子愣了两秒，随即像头小牛犊冲进地里，蹲下来拍拍这个、摸摸那个，转头冲我喊：“爸爸，好多西瓜！”

姐姐搬起一个裂了口的西瓜，顺手掰开，鲜红的瓜瓤露出来，汁水顺着手腕往下淌。“来，地里吃，自家种的，甜！”

我咬了一大口，清凉、香甜。儿子狼吞虎咽，满脸满手都是西瓜汁。姐姐笑着给他擦脸。临走时，她和姐夫挑了十几个大西瓜塞进我的后备箱。“吃完了就回来，家里有的是。”

回县城的路上，儿子在后座睡着了，嘴角边的西瓜汁还没擦干净。窗外的田野在后退，我的思绪也回到了童年。

那时候，老家附近农场的西瓜地像一块巨大的磁石，吸引着村里所有半大不大的孩子。瓜农在地那头忙活，我们在地这头趴着，心照不宣地交换着眼神——我们在等，等瓜农摘完最后一批大瓜，地里剩下些“歪瓜裂枣”，瓜农懒得要，我们便光明正大地牵着牛走进瓜地，牛低头啃瓜藤，我们低头翻瓜。捡到的瓜哪怕小得可怜，砸开了照样吃得津津有味。

又过了些年，村里在山上开荒，各家各户都种起了西瓜。我家也不例外。

西瓜长到碗口大时，父亲开始在瓜地边搭棚。几根竹竿撑起架子，盖上塑料布和稻草，里面一张吱呀作响的竹床、一方小桌、两个矮凳——就是我们夏天的第二个家。

晚上是要住在瓜地里的。防的不是野兽，是人。谁家都有过被偷瓜的经历。瓜棚里蚊香点着，一圈圈白烟袅袅升起，可蚊子还是前赴后继。一晚上下来，胳膊腿上全是包，痒得睡不着。索性不睡了，躺在竹床上看天。

那时的天，是真好看。满天繁星密密麻麻，像打翻了一罐碎银子。月亮升上中天，亮得能看清田埂上蹦跳的青蛙。萤火虫一群一群地飞，像天上的星子落了下来，在藤蔓间游荡。

整个村子也安静。只有瓜在蛙声、虫鸣及偶尔一两声的狗吠中，悄然生长。

西瓜熟了，贩子上门来收，几分钱一斤。父亲算了算账，摇摇头，决定自己拉到县城去卖。天没亮，他就把板车拖出来，西瓜一个一个码好，用麻绳捆紧。他在前面拉，我在后面推，走十几里路才能到县城。夏天的太阳毒辣，沙子路晒得发软。渴了，舍不得挑好的，就敲开一个品相差的小瓜来吃。

我最期待的是晚上。白天卖完瓜，县城的亲戚会带我们去逛街。小小的县城，在我眼里是另一番景象——明亮的路灯、来往的小车、卖冰棍的小推车，构成我记忆里繁华的县城夜晚。最让我兴奋的是走进影院看电影，银幕那么宽，声音那么响，我坐在黑暗里，眼睛都不敢眨。亲戚还给我买了新衣服，又带我去书店挑了一本两元钱的书，那本书我翻了很多年。那个夏天，西瓜很甜，回忆里全是光。

车子驶进小区，儿子在后座翻了个身，嘟囔着说了句梦话。我停好车，准备搬运后备箱里那十几个绿油油的大西瓜。

瓜还是那个味道，只是时光在轮转。如今村里种西瓜的人少了，瓜熟了，也不用人整夜守在瓜棚，反倒是一家摘了瓜，东家送两个、西家塞一个，谁家的瓜甜，左邻右舍都知道。

从前我跟着父亲去卖瓜，如今姐姐催着我回家摘瓜。田没变，瓜没变，滋味也没变。变的，是我们这些在瓜田里守望的小孩变成了大人；不变的，是总有一片瓜田和守瓜人，等着你回去。



浮光笑

空袖

□ 白洪彬

二十岁那年，我初登讲台，接手小学三年级班主任工作。

开学没过几天，我便发现班里的个别学生作业潦草刺眼，笔画歪斜粘连乱作一团。年轻气盛的我，认定这是学生的懒散懈怠，更是对我教学的敷衍轻慢。一股无名的烦闷与怒意，就堵上了心口。

一天下午，上课铃声响起，我抱着一摞作业本走进教室，重重地将本子摔在讲台上，冷着嗓子宣布：“这节课不讲新课，专评作业，我们办一次作业展览。”

我让小组长将作业摊在桌上，翻到本子内页摆好。先选出五本最优，再选写字最差的。优秀作业很快选出，可轮到选差作业时，几个孩子眼神躲闪，谁都不肯伸手，好像怕被本子扎手。

几人凑在一起嘀咕了一会儿，怯怯看了我一眼，手同时指向一本作业本。就在一个小组长伸手去拿的瞬间，另一个孩子突然抢过本子，飞快塞回原处，动作仓促又急切。

“把刚才那个本子拿出来！”我勒令道。

几个孩子听到后，依旧迟疑伫立，无人应声。我又急又气，上前一把抽出那本作业。

封面上，“丁小可”三个字歪歪扭扭，单薄又笨拙。

樟树下

头发的人呢？那么粗暴！恨不得齐着头皮将芸香的头发剪干净！

就那么咔嚓一剪刀，收头发的人就将芸香的美丽收走了大半，也将一个女孩子的美好心情全部收走了。

被剪掉长发的芸香现在满头乱发，像稻田里螺蛳爬动的路线那样纠缠，仿佛黑夜里让人找不到回家的路——剪了头发的芸香第二天傍晚还真的迷路了一回。不过，李子猜想，那是她故意到林子里躲清静去了，才说成是迷路的。

对于收头发的人用十块钱剪掉芸香头发这个事，李子其实是有想法的。在他的心里，芸香最漂亮的就是她那乌黑亮滑的头发了，结成辫子后让李子忍不住总想要去抓几下。芸香在家门口洗头发的时候，李子有时候也会路过瞅两眼，看着她将稻草烧成灰，然后用竹篾簸箕装上，拿开水冲淋两遍。这冲淋过稻草灰的水便是顶好的洗发水了。用这种自制的洗发水洗过的头发又黑又亮又滑，瀑布般披在芸香后背上。这种洗头发的方法在龙潭村一直占据主流，直到李子长到十五岁，才渐渐看到瓶装的洗发水和塑料小包的“海飞丝”进入龙潭村的居民家。

芸香的长头发曾让人羡慕。从一尺两尺长，在稻草灰洗发水的滋养下，慢慢长到三尺长，那可不容易。但是，对于这种羡慕，邻居大姐却只是笑笑，不露声色，仿佛她知道一些什么，但就是不告诉这些孩子。后来李子知道了，其实邻居大姐十多岁的时候也曾留了长长的头发，然后到了一定长度就被卖掉了。为此她也哭闹过，但慢慢发现村子里几乎每一个女孩子都曾有过这种遭遇，便也平静了下来，冷眼旁观着一个又一个女孩子将头发蓄长，又被收头发的外乡人剪掉。这么多年，只要收头发的人来一次村子里，龙潭村就会多出好多短发的妇女和女孩。

芸香，不过是其中的一个。



扁担长扁担宽

□ 董国宾

这是个山城。

城西老火车站，出站口永远蹲着一群扁担工。水泥墙根，男人们扎堆抽烟，扁担横在膝上。他们嗓门粗哑，眼神锐利，为了拉客随时蓄势待发。唯有陈桂兰，独自立在角落，不挤，不喊，静静等着。

她四十来岁，瘦小，脊背微驼。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肩头磨出两个洞，常年搭一条发黑的旧毛巾。她的扁担，裂了两道口，缠满胶布，是丈夫摔断腿时磕的。她舍不得换，一截胶布，一层指望。

十年前，她和丈夫老周从贵州大山来。老周搬水泥，她摆摊卖早饭。后来摊位被清，她扛起扁担，在车站讨生活。所有力气，所有省吃俭用，都拴在老家读高中的女儿身上。

那天傍晚，暴雨刚歇，地面积水，浑浊发亮。火车晚点，旅客稀稀拉拉。男人们盯着大行李箱，眼冒精光。陈桂兰却看见一个老太太，拎着两大袋煎好的中药，步履蹒跚。

她上前，声音很轻：“阿姨，我帮您担，价钱您定。”

老太太眼神疲惫，说要去两公里外的老小区，儿女不在，慢性病缠身，药太重，拎不动。

旁人嗤笑：“远路，没几个钱，白费力气。”

她装作没听见，捆好药袋，扁担上肩，稳稳跟着。一路积水，她放慢脚步，避开水坑，听老太太絮叨孤身不安。到楼下，老人只摸出六块零钱，语气局促不安：“姑娘，对不住，就这点。”

陈桂兰摆手：“没关系，药要紧。”

老太太又硬塞给她两个白面馒头，她小心地揣进兜里。

折返时，天已黑透。路灯亮起，她靠在墙边啃馒头。手机骤响，医院来电，老周搬水泥砸伤腿，复查骨错位，要二次手术，预交八千。

电话挂断，她双手攥紧了扁担。往日有客她不争不抢，这会儿却冲到出站口最前。有人出站，她抢先开口，一改平日温和。

同行老王递给她一瓶水：“今天这么拼？”

她抹汗，眼眶微红：“老周要手术，差钱。”

老王叹气，后来遇到短途客和轻活，都让给她。

有一回，她接到一个学生模样的姑娘，行李多，姑娘赶去考试，急得快哭。陈桂兰二话不说，挑起行李就跑，抄近路穿小巷，硬是在时间截止前把人送到考点。姑娘要多给钱，她只收了原价，抹着汗笑：“考试要紧，快进去。”

还有一次，天降大雨，路面打滑。一个大爷拎着大包小包，包里还有保温桶，桶里是给住院老伴送的饭菜，怕洒不敢走。陈桂兰冒雨接过，扁担挑稳，一步一步把大爷送到医院。保温桶滴水未洒，大爷塞给她一把伞，她撑着伞回到车站，半边身子早已湿透。

深夜十一点，最后一班车到站。她揽下城郊民宿一单，路程远，两箱行李坠在扁担两头，压得肩头旧伤刺痛。她换着肩，咬牙往前走。晚风卷尘，刮得脸疼。

送到时，老板娘递来一碗热粥。她捧着碗，温热入喉，内心也跟着暖了一下，眼泪便掉了下来。

“我不怕累。”她擦了擦泪，喃喃道：“是怕来不及，耽误他的病情和孩子的学习。”

回到车站，人已散尽。她卸下扁担，坐在石阶上，轻轻抚摸扁担上的层层胶布。这根扁担，挑过三餐，挑过学费，如今，要挑起手术费。

远处医院灯火隐约。她站起身，重新扛起扁担。夜色深沉，瘦小身影往前走。扁担一颤一颤，一头是生计，一头是期盼。



地皮菜

□ 丁够生

每次回老家，躺在床上听着打在瓦片上淅淅沥沥的雨水声，我便知道，明早后山上，该长出那种东西了。

果然，天刚蒙蒙亮，母亲就来敲我的房门：“起来吧，去捡地皮菜。”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难得的雀跃，像是去赴一个重要的约会。我揉着眼睛跟在她身后往后山走。山里雾气还没散，淡淡的，像一层薄纱罩在松林间。路边的茅草湿漉漉的，不一会儿就打湿了裤脚。

地皮菜，学名叫地耳，我们高安人叫它“地皮菇”或者“雷公屎”。名字虽不雅，却生动得很——它确实是打雷下雨后才冒出来的，一般长在潮湿阴凉处。

后山的石头缝边和茅草丛下，果然长满了地皮菜。墨绿得近乎黑色，像是大地长出的耳朵。母亲蹲下身子，手指轻轻地拈起一朵，放在竹篮里。她拾得很仔细，太老的不要，沾了太多泥沙的也不要。

“小时候，你外婆每年都会带我捡。”母亲一边拾着，一边说，“那时候粮食不够，这东西救过不少人的命。”她的语气很平淡，像是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。可我知道，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，这不起眼的地皮菜，不知养活了多少山里人。

最难的不是捡，是洗。母亲常说，吃地皮菜容易，洗地皮菜难。这话不假。一朵小小的地皮菜，要反复淘洗六七遍，才能去掉那些夹杂在褶皱里的泥沙和草屑。

洗好的地皮菜放在大瓷碗里，墨绿得发亮，像是一汪小小的深潭。母亲打了几个土鸡蛋，用筷子哗哗地搅散，切几根小葱，再拍两瓣蒜。灶膛里的柴火生起来，铁锅烧热，倒上自家榨的菜籽油。油热了，先下蒜末爆香，再把蛋液倒进去，快速划散。鸡蛋刚凝固，立刻倒入地皮菜，大火快炒，撒盐，最后撒一把葱花，翻两下就出锅了。

整个过程不过几分钟，却像是一场精心准备的仪式。母亲的动作行云流水，几十年做下来，早已烂熟于心。夹一筷放进嘴里，地皮菜滑嫩得像果冻，又带着一点脆生生的嚼劲，鸡蛋的香和地皮菜的鲜混在一起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清润。那味道不像菜，倒像是把雨后的山林、清晨的露水都吃进了肚子里。

吃完饭后，母亲把剩下的地皮菜铺在竹匾里，放在太阳下晾晒。她说晒干了可以保存很久，想吃了随时可以泡开来炒。那些墨绿色的精灵在阳光下慢慢蜷缩，变成一小片一小片的黑褐色，像要把季节都封存起来。

我站在屋檐下，看着远处的山。风软软的，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。这就是家乡啊。没有城市的喧嚣，没有车水马龙，只有山、水、土地，和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朴素食物，地皮菜不过是其中最不起眼的一种。

母亲还在晒着地皮菜，阳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我忽然觉得，这道菜之所以让人念念不忘，大约是因为它太难得了。它需要一场恰到好处的豪雨，需要母亲依旧康健，需要我恰好回家。

而我，终究是要再离开的。后视镜里母亲的身影越来越小，轿车里散着晒干的地皮菜淡淡的泥土味。我知道，我不过是一个在城市里，替故乡保管这一小片雨季的人。

闲话铺

蒲扇摇摇

□ 黄从周

奶奶五十五岁那年，我五岁。那年，她回了一趟娘家，带回二十多把蒲扇，留下几把，其余的都送给了亲友。

奶奶的娘家很远，在广东江门新会区的银洲湖畔。江门也叫葵城，那里有很多的蒲葵树。蒲葵树上的蒲葵叶大而不开裂，脉络分明，色泽光洁，是做蒲扇的好材料。奶奶年轻的时候，常和姐妹们采蒲葵叶做葵扇，以篾丝、丝线缘边，用火烙铁在扇面上烙山水图画，用彩色丝线刺绣动物、花鸟。扇柄就是葵叶柄，讲究人还有用竹、骨、象牙等作镶边的。很多年前，海内外就有新会葵扇的身影。

蒲扇摇来的风，不像电扇那样汹汹急切，也不像空调那样冷气浸骨。蒲扇的风是亲切而自然的。而奶奶唱的歌谣，带着浓浓的广味，是清柔温馨的：“唔摸摸，老鼠捉；莫拖涯，拖哥哥；哥哥好，拖嫂嫂；嫂嫂乖，拖奶奶……”

那时，我父母正值壮年，在生产队里拿工分。每到夏天三伏天，偏又是双抢季节，父母劳作回来，常常是满脸热汗，汗如雨下。奶奶教我们兄妹用蒲扇为父母扇风驱热。父母坐在小板凳上，妹妹为爸爸扇，我为妈妈扇。一边扇，一边数——一下，两下，三下……一百下。奶奶笑、父母也笑。看着我们扇得小脸通红，妈妈心疼得不得了，一声声地喊“乖、乖”，不让我们扇，我们却扇得更有了劲。

“三伏天炎热，扇子借不得；不是我小气，你热我也热。”这是爸爸唱的歌，奶奶教会他唱的。

我们回唱：“小气鬼，喝凉水；凉水凉，扛房梁。”“扛房梁”是睡觉的意思。睡觉时，两个肩膀上对着两根房梁，让人不舒服，也给“不肯借扇子的人”不舒服。

后来奶奶走了，父母年岁渐高，我们兄妹几个也有了自己的小家。我们先后为父母买了吊扇、落地扇，装了空调，他们却嫌电扇吵空调费电，手里依然是蒲扇摇摇。

很多时候，我看见父亲躺在躺椅上摇蒲扇，摇着摇着就睡着了。妈妈则喜欢侍弄蒲扇，戴上老花镜缝花布边，缝上绸布做成的流苏，然后把这些打扮得花里胡哨的蒲扇送给我们。

如今，我家里还有一把奶奶从娘家带来的蒲扇。我把它挂在卧室的墙上。这把扇子，扇面上依稀还可以辨认出上面烙的是一棵榕树。榕树下有一个人，好像手拿蒲扇轻唱歌谣的奶奶。



第26期

樟树下

电话：0791-86849235
本版邮箱：32028011@qq.com